

博雅文学论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

王晓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文学论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

王晓路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王晓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642-3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1920 号

书 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晓路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封面设计: 麦子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642-3/I · 246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2.75 印张 339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政治学的学理探索	22
第一节 社会与文化的结合体:文化批评	22
第二节 社会形态与文化分析	48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	74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分析	88
第一节 界定的难题	90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112
第三节 作为方法论的意识形态	129
第三章 阶级与阶级分析	154
第一节 阶级的划分与界定	158
第二节 新经济社会与社会分层	173
第三节 文化批评中的阶级分析	199
第四章 种族与种族分析	220
第一节 族群社会学:自然族性与社会族性	223
第二节 种族的历史痕迹:多元文化审视	234
第三节 族群文化学:种族表征与族群话语	246
第五章 性别与性别分析	272
第一节 性别社会学	277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295
第三节 性别的文化批判	310
余 论 生态政治与文化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社会学	322
参考文献	342
索 引	359

绪 论

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

——萨特

我们挑了一个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

——德里达^①

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

——福柯^②

本书的论域包括两个需要考察的领域,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是文化批评,主要涉及四个领域的理论话语:文化理论、文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就具体历史时段和涉及范围而言,需要考察“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这一变化复杂的历史成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尽管任何单一的批评模式都难以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对象进行有效地解释,但马克思主义却成为一种探讨的元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只要该社会继续存在,而不论其所呈现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元命题就依然有效并成为论述的起点。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是不同历史时段的产物,对其观察、

① 以上转引自陈晓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 M. Foucault. “Structuralism et Poststructuralism” in *Dits et Ecrits* IV. Paris: Gallimard/Seuil. pp. 431-457. 转引自〔英〕莱姆克(T. Lemke)等著《马克思与福柯》,陈元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思考和解释的角度和样式脱离不了历史文化的语境。在传统人文社科单一分析模式面对新的社会文化对象日渐乏力之时,广泛借鉴其他分析样式、以跨学科为特点的文化批评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最具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领域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变化也颇能说明这一范式的悄然转型。

由于文学理论指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质疑系统^①,因此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元命题、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在新的时期再一次引发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若考察 20 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发生学和批评旨趣,人们可以看到在各个分支领域中,诸多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论述中也大多含有类似的文化政治的内涵。虽然从发生学角度考察,对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缘起可以追溯到比较早的时期,但作为当代人文社科的理论话语之一,并逐步蔓延在欧美及其他国家,则主要是在“二战”以后频繁显现的。当然这也与该时期目标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英国的兴起有关。其实,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二者虽然侧重点不尽一致,但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相当大的程度上有重合之处。因此,在考察作为思想资源以及观念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文化批评的渊源关系时,无疑也要考虑这一思想资源的理论指涉、价值和学理意义。

一般而言,考察某种思想文化的体系既要明了该体系发展的主要脉络,又要尽可能地避免预设该思想体系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而对于历史时段较长、区域范围较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评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对其分析样式的考察需要涉及其外部系统和内在结构。外部系统一般涉及语境、制约性要素或确定性条件以及陈述方式,外部系统一般形成内在结构的特点和张力;而内在结构的规定性又导致其外部理论指涉的有效范围。这种内外透视的角度与理论的话语所针对的文本对象往往形成某种互为逻辑的结构,二者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对

^① See Vincent B. Leitch,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xxxiii.

这一复杂的思想资源的上述两个范围的考察,又必须涉及一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因为,如若单纯以线性方式考察,则有可能忽略其中观念发生的自身逻辑。据此,考察的方式大致可以有如下几种:

其一,历史阶段性研究。即以历时性方式、以某一时段为具体的范围,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该思想的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环境、发展历程以及涉及的问题和人物进行纵向勾勒,在最大限度上凸现其理论意义的同时,将其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论证出该理论陈述方式对观察和分析当代社会经验的可能性,并在时间段上承接思想的延续性,由此把握该理论扩延的走向。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评两个领域的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几个大的方面,所以这一方式难以避免的缺陷是从总体出发,其中所采纳的观察和分析方式均可能过于宏观,而对于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在筛选上无疑存在着一些难以化解的难点。另外,就单部论著的容量而言,对其涉及的许多问题均有可能停留在对所选事实一般性的描述、归纳、整理和泛论的层面上。

其二,通过其代表性人物的理论建构加以透视。目前国内许多论著都采纳了这一方法。因为,每一个领域的发展均难以离开具体人物在该范围的独特贡献,他们在某一阶段中的研究中见出结构性缺陷,从而提出自己的洞见并由此推进该领域的发展。所以,此种考察方式也是学界所通行的。其具体做法一般是对该论域中主要的思想先行者分别加以评述,通过对其理论论著,尤其是代表性论著的解读,并以某种认知同一性的方式来建立理论陈述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一方式可能的缺陷是,其中任何一位学人均是学界认同的领域奠基者,其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又往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以单一论著的容量,不太可能对该领域每一位重要的学者都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必须是依据设定的问题进行理论互文性的探讨,而不能停留在对单一学者的平行分述之上。所以要建构学者思想之间的联系,以达到综述的目的,平均和平行式的分述就难以避免重复和点到为止的通病。

其三,从知识学角度出发,尤其是知识社会学,对该思想资源进行知识谱系的分支性归纳,即在人文社科历史性阶段中,具体考察其理论

话语的有效性和作为知识分支的生成、价值和意义。这一方式既要考虑其理论话语的形成中必然涉及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又必须考虑作为经验发生和理论解释的入思方式。因而,从知识学角度入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事实的罗列,而且可以见出所选研究范围中主要观点的生成。但是,对其所涉及的问题则难以形成平行陈述,因为知识学所涉及的概念、命题和逻辑有着相当严格的明确性。而且,某一种知识性概念没有成为认知主体之前,必须借助于另一种概念的阐述才能相对清晰,因为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知识性概念总是位于一种互文关系中,本身难以不证自明。所以,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交叉的思想资源研究的论域中,既要考虑对事实的筛选和归纳,又要通过在观念形态下依据事实间的问题,建构起某种知识社会学的框架,这一难度显然是单本论著难以解决的,因为,在建构知识学分支概念时,其阐述中的确定性条件、互文关系中的范畴等并不是该知识学的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这一论域如果是意义领域,它大体上就属于文化哲学,而“文化哲学有一些特性,它既代表一套文化意识,但它又被用来考察一些已有的文化现象”^①。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文化研究领域,这一考察最有成效的当属《文化研究的生命和时代——知识结构的政治与转型》(Richard E. Le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Poli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一书,虽然该论著并不主要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评的关系。^②

其四,由于“思想是建立判断(或命题)与推理的活动”^③,而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文化批评,从其主要入思的方式入手,见出该论域涉及的问题及其可能性,并以互文的形式,抽象出该思想论域的几个主要的理论指涉所覆盖的范围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立场。最重要的是,这几个理论范围既是原有历史阶段中的经典或中心命题,又在新的

① 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② 该书的梳理也主要采纳的历时性建构方式。对这一部分的观点参见该书的导论部分。

③ 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新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历史阶段中有较大的调整和发展,以此形成某种发展式研究,亦可有助于研究者采纳某种辩证批评的方式从中整理和分析相关的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式中,意识形态、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分析样式所涵盖的大致领域,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新的时期又一次相遇,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段中,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性质。而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现象,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所采纳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跨学科和方法论整合的方式,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观察、思考和解释的方式:

文化研究是一个学术领域,它结合了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社会领域、文学理论、媒介理论、影视研究、文化人类学、哲学、博物馆研究以及艺术史及艺术批评,以研究各种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学者往往集中于某一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民族性、种族性、社会阶层和社会学性别相联系的。^①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生态政治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等方面,成为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极大拓展的重要论域。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其文化表征形式也随着新的时代,尤其是社会文本和文化产品的样式,而产生着变化。阶级由于社会分层的不断出现,加之国际分工、工作条件、工作性质以及相对贫困的变化等要素,也随之出现了与经典马克思时代不同的特征。种族、性别与社会性别的问题更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文社科的学术生产重镇。身体、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别心理、性、性别特质及其背后的问题反映出了既定分析方式的弊端。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资本主义方式的蔓延、全球产业链的动态排序和区域文化的重新定位。它带来的不仅是资本的跨界流动,而且区域文化资源成为突出的新问题。而以向自然索取和依靠传统能源消耗带动财富增长的方式不仅引发的区域性生态的恶果,而且其背后更是隐含着利益的生态政治问题,这些都

^① “Cultural Studies” 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studies 引用日期:2009年10月28日。本书中的引文,除了列出译者姓氏和出处外,均为笔者翻译。

引发了社会与学界的多重思考。文化分析与文化实践再一次成为追问知识谱系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通过对这几个主要的领域进行分析和论证,不仅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为新的历史时代所奠定的若干元命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期对这些元命题的拓展,而且可以基本上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外部系统和内在结构两个方面的框架,并从中透视出发展的基本脉络并看到问题之所在。当然,这一方式依然很难避免在论述时必须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范围内进行,同时也必然是一种宏观论述。

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涉及面相当广泛^①,本书拟主要采纳上述第四种研究探讨方式,但在具体论述中并不完全拘泥在这一方法论的框架内,也对上述所列问题不采取平均论述的方式,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考察范围和涉及的具体问题,无疑会旁及并讨论到上述其他几种方法以及所涉及的问题。本书也不采纳单一的解释方式,即重新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论题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尔后补充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性命题的缘由、理论指向以及在文化批评中的方法论意义,而是将这些相关命题置入当代社会文化动态发展的语境中,梳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种解释方式,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评中的理论开放性。本书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阶级、种族和性别四个最基本的方面,主要从历史角度进行梳理。在论述中针对问题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参考社会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史学和文学理论等相关的论点。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和观点将穿插在各章节以及余论中。由于单部论著的篇幅所限,该论题也不太可能涉及过多的具体个案,或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分析样本。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需要依据研究对象而定,并没有唯一可行或完全一致的方法,就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的意义而言,均是相对的。最贴近研究对象本身的方式,即是研究者个人依据自身所把握的材料

^① 根据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此书设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411个命题,每一命题分别用500—1000字加以说明。分别以八个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伦理学等。参见“编写说明”,第1页。而文化批评则可能涉及其中好几个学科。

所建立的理论假设、进行的某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已,而且理论假设本身也是一个互文的过程,即对前期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回应。所以,方法只是相对而言,其有效性建立在研究对象的问题结构和波及的范围之中。但就人文社科的基础研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在材料的基础上说话,即依据第一手材料(primary sources)和第二手材料(secondary sources)的收集、整理、研读和分类。若一味先进行理论观点的预设,再依据这些观点寻求支撑性材料,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就可能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研究的有效性一般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材料有新的挖掘。但是这一点对于研究西学的国人来说有相当的困难。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地域的相隔并不是主要困难所在,因为互联网提供了最大和最快的资讯。但是由于版权等原因,许多学术论著和期刊还不能及时看到全书和全文,阅读其他形式的材料,如过刊与报纸等也不方便,同时对一些材料也不能方便地反复研读,所以还是需要依靠传统的方式进行研读。此外,国内目前的图书馆系统、信息处理与服务方式,例如馆际借书等便捷程度,与西方较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和主要的大学图书馆相比,还有差距。因此,要挖掘出更为有价值的材料,困难是很大的。其二是研究者在研究领域中所拥有的视野、所运用的方法和由此带入的洞察力。因为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因而中国学人的研究与其他各国学者在同一领域中得以共享的只能是上述两类,而绝非是依据外文材料进行的现代汉语转述或编译。由于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在事实上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文学术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思路,因此,中国学界的人文社科研究亦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学。它需要将西方局部知识与中国问题进行对接,需要奠定应有的论证基础,由此才能形成认知共同体,对相关问题作出有效回应。但与此同时,这也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和认知体系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所幸笔者在获得课题后,于2007年起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而后2008年又到香港城市大学汉语、翻译和语言学系任访问学者;2009年又赴美国三所大学进行系列讲座;2010年获得香港田家炳基金到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英文系和中文系进行讲座。所以在工

作之余,得以利用各校的图书馆系统和馆际互借的优势,进行了一些一手材料收集、整理和研读等基础性工作。本书也断续写作了四年之久。本书的一个努力的方面也是力图对该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以保证资料的价值和论证的有效性。对于第二类研究有效性的可能,则只能依据自己有限的认知尽力为之了。

自五四以来,20世纪末的新时期是中國大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译介期和西学复制期。学界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学术氛围中,持续进行西学的翻译和引进,其中尤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主,包括一些涉及上世纪初译介相对较少的领域,如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和文化理论等。中国大陆学界在较短的时间内,实际上将欧美学界长期形成的理论体系和言说方式进行了现代汉语的快速转述,国人由此缩短了人文学术理论话语的时间差,获得了以诸多新的术语、范畴和概念群为标识的言说资源和入思的方式。可以说,译介一直伴随着中国大陆人文社科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感受到了国际学界的知识挑战。然而面对现代知识样式,我国的一些学术实践主要是基于翻译—阐释和刺激—反应的模式。具体而言,即对异域理论的跟进多于关联性研究。需要指出的是,理论是对经验的解释和化约式的言说,其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对事实和经验的观察、提问和解释的陈述方式,它随历史不同时段的经验在元命题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和更新,也由此使我们得以动态地看待原有的方式。故任何经典理论即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们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段中,就其社会文本和文献文本的事实以及文本特质所进行的阶段性的观察、思考和有效解释,因而理论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之中。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有效的理论背后,也往往有一个十分重要文本环境(text medium),涵盖其文化传统和阐释传统。而一种相对完整的传统和行为系统又受制于其个性、社会和文化三大系统^①,由此构成一个理论生产相对完整的外围结构。而一个理论观点的出场常常又与理论家的致思方式以及该领域整体结构中的缺陷有

^① 此处指帕森斯的“完整具体的行为系统(Completely concrete system of action; personality system, social system cultural system)”,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前引书,第136页。

关,所以,理论言说可以使人们看到原有整体结构中潜在的突破口。理论的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再生产的循环方式。

按照萨义德(Edward Said)的论述,观念和理论从某一文化向另一文化迁移的情形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特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置于另一时期和环境中的可能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和观念的移植、转移、流通以及交换的所有解释会异常复杂。^① 所以,当这些理论旅行到了其他的文化区域并获得文化他者(如中国大陆)的消费时,由于语言文字符号的非等值迁移、历史阶段的非同一性、社会生活和文本的差异性以及语境环境改变等要素,就有可能发生在针对不同问题的言说时发生“能指与所指”性错位。因此,对于舶来理论的首要工作往往不是即席借鉴(借用口译中的“即席口译”说法),而是理论的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翻译、诠释、改写和借鉴等。若将西学中的那些汉语化的理论术语和实践方式跨越时空的界限,一味套用在中国社会文本和书写文本之上,那就可能是理论的自我想象和实践,而不是学理性的研究了。此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之中。一如“后”字当头的各种理论话语样式曾一度弥漫在学术生产中。其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是一个不断融入其他语言成分和外来文化因子的混合物,如不少词汇即是中原周边地区群体不断混合的产物,以及来自佛经的翻译或从日文、英文等他者文化语言借鉴的结果。它的发展在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得益于自然化合、翻译和借鉴,包括其他文化区域的学术性语言表述。因此,汉语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语言和言语体系。外来词语的不断融合是历史文化逻辑的使然。今天国内学界所通行的大多数概念和范畴,包括一些早期的术语,也多是汉化的结果,并没有几个是原生态。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它们在不同区域中的具体内涵,在实质上可以说是相当不同的,而且其中并不存在某种概念专利或版权,即不专属于它产生的原发地。“事实上,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概念的性质,乃是它从本质上的可争论性,其意义更多地变成了

^① See 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Edward Said Reader*. Edited by Moustafa Bayoumi and Andrew Rubi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p. 195.

在特殊的语言游戏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些规则。”^①许倬云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②。

所以,中心和边缘是一个互为他者的视角。中国近代一些运用在学术领域中的概念多是先从日本舶来的,而日本也是多从欧美诠释过去的。在当代则多是通过翻译从欧美引进的。这种混杂的现象实际上是许多国家语言文化传统中的共同现象。越是文化大国,其文化宽容度和包容性就会越大,而不是相反。杂语共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已经成为各个文化区域的常态。理论生产的问题同理。但问题是,单一的翻译—阐释模式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认知共同体。

中国大陆学界对理论的渴求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源自经济文化的升位和民族心态的变化。中国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强大挑战,一直十分被动地面对这种影响和挑战。文明古国的悠久历程和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现状形成强烈的反差。迟到新时期,中国大陆在初步完成了经济转轨的历程后,才开始对文化建构重新有所意识,并态度鲜明地、主动地进入到国际社会,力求从一个受影响和被挑战的文明古国进入到试图影响他者文化的阶段,这一点可以从2008年成功承办奥运会、2010年承办上海世博会以及在世界各国开办孔子学院为历史性标识。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学术界。所以在新时期,有关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中国声音的提法,或民族性诉求等,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另一原因是中国大陆在现代进程中,也必须包括人文社科学术本身的现代进程,中国大陆的人文社科的学术需要在一种认知共同体的框架内,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现代观念的知识共享。

① [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②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

中国学术本身亦有内在规范化和共享知识平台的客观要求。但是我们目前尚有较大的差距,如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还没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和标准化要求,最为基本的学术规范甚至在高校还处于被呼吁、学习和实施当中。^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国际关系研究,也不是在话语层面上对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实力类比。它的生命力在于依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在国际学术认知共同体的框架内对学术各个分支领域本身的有效推进,它必须是一种学理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生产,仅此才能形成真正的影响,而不是狭隘民族情绪的简单表达或宣泄,也不是量多就可以获胜。因而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是人类所共享的。各文化区域的群体在历史各个阶段中的精神探索样式和理论表述均是可以借鉴和利用的。对于他者语言的采纳,钱锺书的“入化”可以说是很高的境界。概言之,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于学术无补,而且极其有害。可喜的是,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认真和艰苦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语种的翻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这些积累多年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新时期初期,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述和研究多和美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时美学还是一个刚刚被容许讨论的领域,文化刚开始打开国门,诸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刚从“牛棚”回返,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消化一拥而入的“新知”。所以当时的许多讨论延续的是中国在20世纪以来“器物、制度和文化”的话题,在民族建制到国家建制过程中,出于对“文革”的反省和对世界格局的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回归到“文化热”的集体认同方式上。“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各家在观点上虽然有争论,但知识结构大致相同,思想趋向也相对同一。”^②在当时

① 笔者认为这一规范化的努力最为显著的就是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

②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页。

令人振奋的文化热中,如此多的“新学”有待吸取,作为一种学术的人文思想与作为行为的文化意识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专门就文化理论问题进行学理性的专项讨论。上一世纪中期在英国所发生的文化研究也还未被国人所知晓。而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美学”则刚刚松绑,频繁进入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和这一领域的结合,在较大程度上也是学术制约性因素的使然以及策略上的考虑。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两部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重要选集。今天,从这两部论著中依然可以看出这个领域在短时期发展的雏形。

第一本为《马克思主义和美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美学理论》^①。此书的目录为:序;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美学理论和艺术:第一章:主要文献资料;第二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艺术;第三章:革命无产阶级与艺术;二、美学与实践,美学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美学;第五章:实践与审美客体因素;第六章:实践与审美主体因素;第七章:艺术的审美本质的社会基础;第八章:艺术——世界“与人关联”的图画;第九章: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生活和艺术中的典型;第十章:“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第十一章: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第十二章:关于资本主义对艺术的敌对性问题;第十三章:我们的时代对艺术有利吗?第十四章:现实主义;第十五章:列宁的文学艺术党性原则;译后记。

现在看来,这部译著依据了传统的认知和术语,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对这一本论著的翻译介绍应当算是相当有分量的。首先作者敢于公开地讨论所谓资产阶级的美学问题,而且把该问题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直接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时代的合法性;其次还讨论到社会与人等相关问题。当然,其整体上的论述还是延续着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中国大陆学界翻译介绍了这位东德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也有一种间接的文化缓冲作用,并为国

① [民主德国]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美学理论》,佟景韩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

内学界潜在地表明马克思在当代所具有的可能性。

第二部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①。该书的目录为：前言；《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德国和奥地利部分；法国部分；英美部分；附录。这部书较前一部书晚出三年多，当时的学术环境已经大为改善。所以一直为认为是“修正主义”或“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的论述也可以得到翻译出版。作为直接翻译而来的分类性资料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谓是相当大的。这两部书为90年代开始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哲学和美学等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频繁地进入了中国大陆学界的视野并由此激发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提上述两本出版多年的译著。

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支撑点和思考框架，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它已经以多种形式结合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状，实际而有效地内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系统之中。而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有必要不断重新解读这一中国当代文化思想中最重要的资源，包括当代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此比较全面地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能力。其中认真、全面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发生、发展和问题，在深入剖析、认真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基础上，可以利用多重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完善这一宝贵的思想解释系统。由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盛行时间较长，因此人们对此有某种忽略感。但是，马克思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性思想，因此只要这一社会形态持续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是理论分析中绕不过去的资源。

我们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有必要重新解读最伟大的理论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可能的“资本主义以后”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或“终结”的标志，而是认为这恰恰表明，在一定程度上，

^① 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